

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研究

王艺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摘要：晚清以来，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活动日益频繁，徒步旅行亦成为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北洋时期，在全球长距离旅行风潮与中国社会相对开放的背景下，来华外国徒步旅行者的数量与活动范围显著扩大，其行迹频繁见诸《申报》《大公报》等民国报刊。本文以北洋时期报刊报道为史料依据，系统梳理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的主要类型与具体事例，分析其旅行动机、活动方式及社会影响。

关键词：徒步旅行；在华外国人；北洋时期

DOI：10.69979/3029-2700.26.04.093

晚清以来，中国门户逐渐打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开展经商、传教、旅行等活动，徒步旅行也成为其重要活动之一。北洋时期，外国人在华徒步旅行人数与规模再创新高，相关事例也常常登上《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其性质与目的亦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既有以长途徒步挑战自我、彰显个人精神品格者，也有借行走经历扬名示众、激励世人者；既有以游历中国、观赏异域风光为主要目的者，亦不乏关心中国时局、试图接触军政要人的旅行者。此外，个别来华徒步者在旅行过程中从事带有非正义性质的学术考察与探险。通过探究这一群体，不仅可以还原北洋时期外国人在华流动与活动的具体面貌，而且对于理解北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外关系均有重要价值。

近代在华外国人的活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探险者等群体，重点讨论其在宗教、商业中的角色。对于外国旅行者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学界已有研究重点关注晚清时期的外国人在华游历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也有从制度、法理与中外条约层面出发，论述清政府对来华游历外国人的管理。数十年间，研究重心从论述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游历的危害性，逐渐转向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在时间范围上，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时期，而对民国时期关注较少；在研究主体上，对于来华外人的徒步旅行这一特定游历形式，多置于外交史、旅游旅行史、中外交通史等框架之下讨论，而较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考察。因此，本文将聚焦北洋时期中国本土主流报刊中关于外国人在华徒步报道，梳理在华外人徒步事迹，分析其徒步的动机与社会影响。

1 时代背景：外国人来华游历的制度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仅在广州一口通商，只允许来华通商的外国人在广州与公行打交道，严禁外国人私入内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内地被迫正式对外国人开放。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对于英国人进入内地游历规定：“英国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中法《天津条约》则明确了法国人游历中国内地需要持有效证件：“凡大法国人欲至内地及船只不准进之埠头游行，皆准前往，然务必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领中、法合写盖印执照，其执照上仍应有中华地方官钤印以为凭。”

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国人进入内地游历仍然有较严格的限定。1912年2月，三名日本人来到安徽大通游历，他们既没有中国政府的护照，也没有日本领事馆的护照，大通军政府向外交部通知后，外交部决定“将该日人等护送就近通商口岸日本领事，并转告以现各处均有军务，未便外人游历，俟大局平定，再行发给护照。”同年，法国人白尼进入云南个旧游历并引发事端。外交部通过区分“内地口岸”与“边境口岸”的不同性质，成功拒绝了法国人引用最惠国条款将其免照游历范围从50里扩大到100里的企图，进而限制其深入中国内地游历的行为。

随着局势渐趋稳定，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在华外国人身份构成由以往的商人、传教士为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就包括来华徒步旅行者，他们用徒步这一特殊方式实现了与中国社会乃至政府的深度互动。

2 北洋时期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

民国初年,时局混乱,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国人进入内地游历仍然有较严格的限定。1912年2月,三名日本人来到安徽大通游历,他们既没有中国政府的护照,也没有日本领事馆的护照,大通军政府向外交部通知后,外交部决定“将该日人等护送就近通商口岸日本领事,并转告以现各处均有军务,未便外人游历,俟大局平定,再行发给护照。”同年,法国人白尼进入云南个旧游历并引发事端。外交部通过区分“内地口岸”与“边境口岸”的不同性质,成功拒绝了法国人引用最惠国条款将其免照游历范围从50里扩大到100里的企图,进而限制其深入中国内地游历的行为。

随着局势渐趋稳定,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在华外国人身份构成由以往的商人、传教士为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就包括来华徒步旅行者,他们用徒步这一特殊方式实现了与中国社会乃至政府的深度互动。

北洋时期,对于徒步旅行的倡导已经出现在各大报刊上,其中不少是由外国人撰写。1920年,中国报刊《中华英文周报》刊载了美国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一篇探讨乡间徒步益处的文章,部分内容为:“我认为它(徒步)有助于陶冶民众情操,使民族气质趋于温和……并加强和促进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除了步行者,没有人会以如此友善和宽容的目光看待世界……而且,由于他更自由,心智更闲适,他与自然保持着一种更密切、更有生命力的关系。”这篇论述徒步益处的文章出现在这一民国社会颇有影响力的报刊中,足见徒步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此文聚焦于乡间徒步者与自然的互动,则体现出徒步旅行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活动形式,而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报刊宣传之外,许多由外国人发起的社会团体组织也徒步旅行活动,加速了徒步旅行观念的扩散。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提倡各种“强健体魄”的活动形式,并将其与“传教使命”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在上海等地定期举行活动,其中就包括徒步旅行与郊游活动。例如,基督教女青年会曾在1925年建立徒步俱乐部,在上海宝山、徐家汇等地举办徒步活动,包括参观修道院与乡间徒步等。此外,由外国人建立的兴趣类组织也推动了徒步旅行的风靡。上海摄影协会是中国最早的摄影组织之一,

由在华外国人创办,活跃于1902年至1925年。协会曾多次组织徒步形式的摄影出行,包括前往苏州、宝山、嘉定、上海老城、松江、江湾、南乡、昆山、武松、龙华楼、苏州溪和浦东造船厂等地的考察。正是在这样的舆论与社会环境中,越来越多以徒步为方式的外国旅行者进入中国,其行走事迹得以频繁见诸报端,并引发社会关注。

来华进行徒步活动的外国人,有许多是以环球徒步的名义进入中国。19世纪中后期以来,“环球徒步”——即长距离、跨文化、跨文明的行走——在全球兴起。通过环球徒步,旅行者旨在展示自身坚韧的精神品格与自我修养,同时也试图通过自身经历对大众产生激励作用。随着一战前后全球交通网络扩展,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加深,中国逐渐进入环球徒步者的行走版图之中。

一位来自爪哇的新闻记者从1922年开始环球徒步的旅程,他称自己旅行的动机为“居留政府及外族之种种刺激,其为团体及华侨之人格,而牺牲个人及家庭之幸福,作牺牲之冒险事业”;他此行旨在“唤起人群在世界之观念,作世界的考察”。具体目的有三点:“(一)欲实知各文明国的文化政治风俗教育实业之进步;(二)欲以自己训练劳苦发扬国民之忍耐性;(三)欲以所经历之地所经见之事,作环球游记,以贡献于国人”。他从爪哇出发,游历新加坡、柔佛、暹罗等地后进入中国,一年后抵达天津,计划继续北上至海参崴,再向西步行至欧洲与北美。

环球徒步旅行者常在沿途举办讲演,借此展示其精神品格,并以门票或捐赠所得作为继续旅行的经费。1919年,美国人威廉说甫与四名友人一起从意大利出发,计划共同徒步旅行全球。四年后,只剩下威廉说甫一人抵达天津,其余四人均死亡。四年间他历经“千辛万苦,阅历极富,艰难挫折,坚忍耐劳,才到天津青年会”,他面向青年会成员,演讲自己旅行的经过,并将票钱作为旅行费用。世界长途旅行家、捷克新闻记者卜吉比索尔与秘书于1927年出发,矢志“打破前此四万基罗米达(即kilometre,千米——引者注)世界旅行之纪录,不避艰险,毅然成行”,两年半后二人抵达天津。卜吉比索尔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在津期间“无论何种社团俱乐部,欲延往演讲”,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予以旅费,帮助两人完成徒步环球的壮志。

来华徒步旅行者并非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局外

人”，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考察中国风土人情与社会经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也出现了转变。1916年，一位名为J·A·杰克逊（J. A. Jackson）的旅行者徒步游览了安徽多座名山，包括九华山、天台山和黄山。在游览之余，杰克逊对当地茶产业进行了考察：“徒步的终点是屯溪，那是安徽较繁荣的产茶区的中心。在考察大型茶叶烘干厂时，我发现出口贸易中普遍使用普鲁士蓝进行着色。我得知，尽管中国的种植者和发货方反对使用这种染料，但某些外国买家坚持要求使用。六个品牌的茶叶使用了这种染料。”1925年，美国一环球旅行团的团员在游历天津后表示：“中国社会平定，人民均有丰裕气象。等经过各地所见者，均属太平天下，此乐土也……华人待人接物，均极和蔼。吾等受此之感动极为深切，以后吾等所至之处欲求如是谦让之风者，盖亦鲜矣。”他们对中国社会治安状况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彼常闻中国多有土匪，然自信旅途绝无危险。”德国徒步旅行家马丁在游历二十六国后于1929年抵达中国，一路上他“专门收集风土人情风景”，并称“此次来华，极为各地华人所欢迎”。

经济社会之外，许多来华徒步旅行者亦关心中国时局，甚至积极联络北洋政要。1923年，来自德国、波兰的两名环球旅行家从哈尔滨出发，两年间已经游览了中国内地各省。1925年10月，两人受中国青年会邀请，在天津进行演讲，两人与三百多名听众共同“三呼中华民国”。1926年，意大利人吉伯利和德国人贡登格尔在鄂、湘、豫等省游历，期间会见了许多军政人士，唐生智、吴佩孚、樊钟秀等人均接见了这两位旅行者，并“称赞其冒险直前之精神”。两人沿京汉铁路北上，与顾维钧等人会面；又从京到津，会晤张作霖等奉系军阀重要人士。1929年，土耳其旅行家于巴罗、克玛尔加姆两人进入中国徒步旅行，期间会见晋系将领孙楚。两人与孙会面期间“谈及中国革命问题，对总理之三民主义尤其赞赏，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达到真正自由之平等，实现总理理想之大同世界”。两人表示，中国与土耳其已经建交，建立起了密切关系，并将土耳其之回教文赠给孙楚党部，留作纪念。外国徒步旅行者在中国内地的行走及其与军政要人的频繁接触，显示出徒步旅行在这一时期已被赋予某种超越旅行本身的政治意义。

然而，受中国时局影响，来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仍然存在危险与不确定性。日本旅行家波江野龙氏在中国

徒步旅行期间“多次遇匪”；环球旅行家、波兰人波多克于1928年在苏州北潭子湾被抢劫，引起租界当局高度关注。

3 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徒步旅行之影响

北洋时期在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虽然仅仅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社会群体，但却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多维度的深刻影响。

首先，外国徒步者的行迹频繁见诸中外报刊，其行迹往往被塑造成“奇闻”“壮举”。这类报道不仅让徒步旅行更加广为人知，也使徒步这一行为逐渐脱离单纯的交通方式，转而被赋予文化、道德乃至政治意涵。

其次，外国人以徒步方式深入中国内地，对晚清以来形成的外国人游历制度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北洋时期，来华徒步旅行的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官署在身份核验等工作的难度与不确定性。1922年，两俄国青年在中国境内步行，他们每经过一地，均需当地警察所长等官员意义签字，以资证明。上文提及的波兰人波多克与其德国同伴徒步游历中国十余座城市，两人每到一地，就需要找当地官厅或者机关在其护照上盖印章。此外，正如上文提及，来华外国人也面临着遭窃等治安事件，需要地方政府乃至租界势力的介入。因此，地方政府往往通过频繁查验护照、要求逐站签字盖章等方式，对徒步者实施实时性监管，以弥补既有游历制度在应对此类问题时的不足。

最后，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徒步活动的盛行。他们的宣讲使许多中国先进青年看到培养自身坚毅精神、唤醒民族救亡意识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自发建立的徒步旅行团风靡一时，规模较大的徒步团体有全国步行团、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友声旅行团等等，立志步行全国乃至世界。但受限于战乱、物质匮乏等因素，许多成员中途退出，致使各旅行团很少能实现出发前定下的目标。知名徒步旅行家潘德明作为亚细亚步行团的一员，与其他团员于1930年6月从上海出发，但旅途中其他团员接连退出，潘德明独身一人历时七年完成了徒步全球的壮举。而后，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间徒步旅行活动越来越少，难以恢复到曾经的规模。

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虽然在整体规模上有限，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徒步者的行动与讲演，以及报刊的呈现，徒步旅行逐渐超越单

纯的交通方式,成为一种承载文化意义、彰显精神价值的活动。北洋时期在华外国人的徒步旅行,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外国人在华活动的认识,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中徒步这一特殊旅行方式、相关旅行文化与制度应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M].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3]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M].1.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
- [4]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M].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5]柴松霞.略论晚清政府关于来华外国人内地游历的执照制度[J].时代法学,2007,(04):52-57.
- [6]柴松霞.晚清政府关于外国人内地游历政策的特点与评价[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06):71-75.
- [7]胡忠良.从档案谈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J].历史档案,2002,(02):101-105.
- [8]刘甲良.晚清外国人赴内地游历获允[J].故宫学刊,2015,(03):347-354.
- [9]马寅虎.试论近代中国的入境旅游[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106-108.
- [10]宋振春.入境旅游与近代中国的开放[J].文史哲,2004,(06):86-92.
- [11]Liang C. The Shanghai Amateur Photographic Society: An Early Photographic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Westerners in China[J]. Writing Photo Histories, 2019, 10(1).

作者简介:王艺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3级本科生。本文系2025年南开大学“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步万里:民国时期青年徒步旅行研究(1912-1937)”(202510055136)阶段性成果。